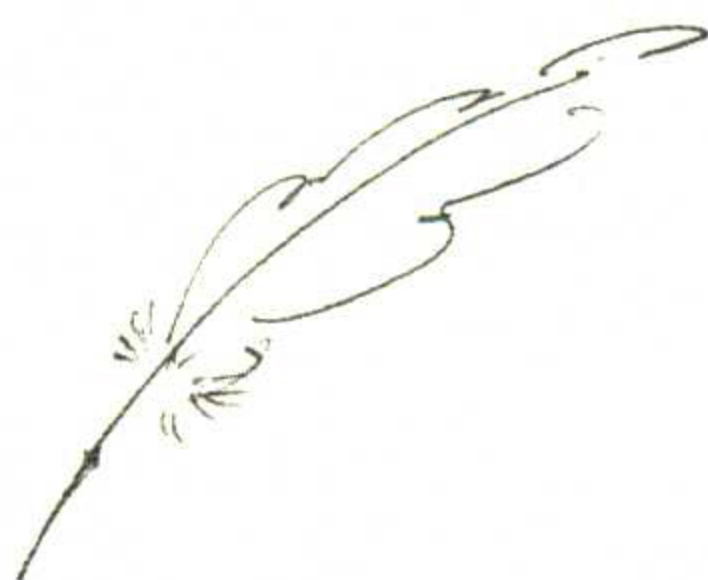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布鲁姆集

刘小枫 ● 主编



[美] 阿兰·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 爱的设计

——卢梭与浪漫派

The Project of Love:  
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s

胡辛凯 ● 译

华夏出版社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 et Commentarii

HERMES

布鲁姆集

刘小枫 ● 主编



# 爱的设计

—— 卢梭与浪漫派

The Project of Love:  
Rousseau and the Romantics

[美] 阿兰·布鲁姆 Allan Bloom | 著

胡辛凯 | 译

华夏出版社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美)阿兰·布鲁姆(Allan Bloom)著；胡辛凯译. — 北京：华夏出版社，2017.1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ISBN 978-7-5080-9010-8

I. ①爱… II. ①阿… ②胡… III. ①卢梭(Rousseau, Jean Jacques 1712-1778)—浪漫主义—文学研究 IV. ①I565.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260053 号

## 爱的设计——卢梭与浪漫派

---

著 者 [美] 阿兰·布鲁姆

译 者 胡辛凯

责任编辑 马涛红

责任印制 刘 洋

出版发行 华夏出版社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装 订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7年1月北京第1版

2017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 1/32

印 张 10.75

字 数 300千字

定 价 59.00元

---

华夏出版社 地址：北京市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网址：www.hxph.com.cn

电话：(010)64663331(转)

若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 “布鲁姆集”出版说明

阿兰·布鲁姆(1930—1992)因其《美国精神的封闭》(1987)一书引发争议,不仅在美国名气很大,在我国读书界也名气不小。我们知道,他是出生于普通社工(social worker)家庭的才子:15岁上芝加哥大学,18岁本科毕业,25岁以研究古希腊修辞家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的博士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38岁那年(1968),布鲁姆翻译的柏拉图《王制》出版,并附有义疏,为他赢得了古典学家的声誉,尽管译文因严格按字面翻译而过于生硬,受到不少批评。同一年,布鲁姆还出版了他翻译的卢梭《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11年后又翻译出版了卢梭自认为最重要的著作《爱弥儿》(1979)。无论柏拉图的《王制》还是卢梭的《爱弥儿》,都是大部头经典。我们可以设想,倘若不是哈钦斯(1899—1977)校长划时代地改造了芝加哥大学本科教育,确立起“阅读大书”(Great Books)的博雅教育理念,<sup>①</sup>布鲁姆这样罕见的才子恐怕不会把自己的大量人生时间用来翻译这样的大部头经典。

《美国精神的封闭》引发的争议让我们想起卢梭在39岁那年因《论科学和文艺》而引发的争议。尽管卢梭在其写作生涯的开端就惹事,布鲁姆惹事时已经57岁,他们惹事的性质都一样:挑明了民

---

<sup>①</sup> 参见哈钦斯等著,《大学与博雅教育》,落崖编/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5。

主政体必然会面临的公民教育难题。《美国精神的封闭》有这样一个副标题：“高等教育如何导致民主失败和大学生心灵枯竭”（How Higher Education Has Failed Democracy and Impoverished the Souls of Today's Students）。在卢梭的时代，民主政体尚未形成，不可能谈论相应的高等教育问题，但《美国精神的封闭》与《论科学和文艺》所挑明的问题一以贯之：即便民主政体也应该封闭国家精神。

建立民主政体得凭靠哲学，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哲学自然会成为高等教育的基础。民主政体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智识人群体不再受任何建制约束，除非自己约束自己。由此不难设想，在开放的民主政体中，五花八门的哲学主张难免导致国家精神的混乱。《美国精神的封闭》表明：哲学的民主状态会危及民主政体的国家精神。布鲁姆去世前一年与同仁编辑过一部文集，他用书名及其副标题进一步挑明了这一问题。<sup>①</sup>

问题的吊诡在于：“美国精神”恰恰是心仪民主政体的哲学家们打造出来的。建立民主政体首先需要靠自由的哲学破除原生性的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又需要阻止哲学的自由破坏民主政体的立国精神。布鲁姆呼吁“封闭美国精神”，我们则仍需要致力于“开放中国精神”——我们的许多智识人会说，理由很简单：尚未“开放”，谈何需要“封闭”。

除了翻译大部头经典和教书育人培育好学生，<sup>②</sup>布鲁姆还写过

---

<sup>①</sup> 参见 Allan Bloom/Steven J. Kautz 编, *Confronting the Constitution: The Challenge to Locke, Montesquieu, Jefferson, and the Federalists from Utilitarianism, Historicism, Marxism, Freudism*, Washington, DC, 1991。

<sup>②</sup> 参见 Michael Palmer/Thomas Pangle 编, *Political Philosophy and the Human Soul: Essays in Memory of Allan Bloom*, Maryland, 1995。

一些绎读西方经典的文章,以政治哲人姿态与破坏政治生活基本原则的民主智术师们搏斗。布鲁姆从自己的老师施特劳斯那里懂得:

就算人们真的不需要绝对意义上所讲的政治哲学,只要某种错误政治教导会危害某种合理的政治行为,人们还是需要政治哲学。如果芝诺未曾否认运动的真实性,就没有必要去证明运动的真实性。如果智术师们未曾破坏政治生活的基本原则,也许柏拉图就不会被迫精心营造他的《王制》。<sup>①</sup>

布鲁姆绎释经典有两个显著特色:首先,以绎读文学经典为主;34岁那年,他就出版过《莎士比亚的政治学》(1964)。第二,其文风表明他不是为学院人写作,而是为普通大学生甚至知识大众写作——这意味着布鲁姆自觉地在做反向启蒙教育。

西方文史上的经典大家很多,布鲁姆主要绎释的是柏拉图、莎士比亚和卢梭的作品。可以推想,他选择这三位伟大的西方经典作家,与他思考自己的国家的政治生活品质息息相关。更明确地说,布鲁姆尤其关注古典作品中的“爱欲”主题,想必与美国大学上世纪60年代经历的“文革”有关。这场“爱欲解放”运动爆发时,正在康奈尔大学执教的布鲁姆才30多岁,他所经受的思想冲击恐怕不亚于我们所经历过的“文革”。美国的“文革”历时不长,其后续影响却未必逊于我们的“文革”。两种“文革”固然不可同日而语,却有着共同的品质:爱欲的民主化。由于“文革”后的中国更坚定了

---

<sup>①</sup> 施特劳斯,《苏格拉底问题与现代性》(增订本),刘振、彭磊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16,页125。

#### 4 爱的设计

拥抱美国式“文革”理想的决心,布鲁姆对西方经典的绎读在今天也适合我们的脾胃。

“经典与解释”系列已经先后翻译出版过布鲁姆的若干著述,在一些热心朋友的建议和努力下,我们将布鲁姆的所有著述翻译过来(含未刊博士论文),结为专辑,以飨读者。

刘小枫

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西方典籍编译部丁组

2016年10月

## 中译本导言

### —

阿兰·布鲁姆(Allan David Bloom)1930年9月14日出生于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16岁那年和他的母亲与姐姐一起迁居芝加哥。也就是在那一年,他和罗蒂(Richard Rorty)同时以“少年大学生”的身份进入芝加哥大学,这个后来“比他的出生地更像是他真正的家”的地方。也正是在那里,他遇到了影响他一生的施特劳斯(Leo Strauss)。对当时的布鲁姆来说,读政治理论就意味着读施特劳斯。即使是在巴黎游学的那会儿,施特劳斯的书和未刊文稿也是他寸不离身的东西。<sup>①</sup>施特劳斯为年轻的布鲁姆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别的学者未曾触碰过的世界,而这个世界也是后来布鲁姆试图向他的学生展现的。

事实上,施特劳斯的许多学生同时也是布鲁姆的学生,并且首先是布鲁姆的学生。施特劳斯培育了施特劳斯派,但却是布鲁姆壮大了它(虽然这或许有悖于施特劳斯的意愿)。尽管如此,布鲁姆却从未打算“另立门户”,就像唐豪瑟说的,“没有谁比布鲁姆在守卫施特劳斯的遗产方面做得更得力”,他总是不停地提起施特劳斯,不停地敦促他的学生去阅读施特劳斯和施特劳斯所致力的那些大书(great books)。

---

<sup>①</sup> 参福尔廷(Ernest Fortin),《忆师友:布鲁姆,1930—1992》(Friend and Teacher: Allan Bloom, 1930 - 1992),载于*The Crisis Magazine*,1993年1月1日。



布鲁姆是一位杰出的学者。他于20世纪60年代翻译的《理想国》译本至今仍是英语世界最好的译本之一。<sup>①</sup>他翻译的《爱弥儿》(*Emile*)和《致达朗贝尔论剧院的信》(*Letter to D' Alembert on the Theatre*)则早已成为英语世界通行的标准译本。他的那本“超级学术畅销书”——《美国精神的封闭》——至今仍是人们反思高等教育,反思60年代那段历史的必读书。<sup>②</sup>

### 二

《爱与友谊》(*Love and Friendship*)是布鲁姆和出版商西蒙与舒斯特签订的第二本书。在这本书中,布鲁姆用他最擅长的“解经技艺”处理了他毕生最关心的爱欲(*eros*)问题。在布鲁姆看来,现代人已经失去了爱的能力,他们是孤立的个体,拥有的只是临时关系(*relationship*)。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霍布斯、洛克以降的自由主义。自由主义不再像柏拉图和卢梭那样严肃地对待爱欲,不再赋予爱欲其所应得的地位。在无爱欲的现代性面前,人与人的联合丧失了自然的基础。为了使贫乏的布尔乔亚世界重新焕发出爱的生机,布鲁姆试图引领他的读者走上一趟“上升”之旅,从卢梭的浪漫主义出发,取道莎士比亚,最终来到柏拉图,而这三位都是布鲁姆一生最喜爱的思想家。

在题为《爱欲的堕落》的导言中,布鲁姆开门见山地宣告了“爱欲之死”。爱欲,在现代科学的还原论意识形态和不受约束的

---

<sup>①</sup> 萨克斯(Joe Sachs)在他的《理想国》新译本序言中写道:“不管这些年来我陆陆续续读到什么新译本,我总是会回到布鲁姆的译本,因为它仍是目前最准确的。”

<sup>②</sup> 据估计,《美国精神的封闭》的发行量甚至超过了所有其他施特劳斯派学者(包括施特劳斯本人)全部著作发行量的总和。

民主教条的围剿之下,已经奄奄一息。如今,爱欲是性,是关系,是权力,是契约,但唯独不是它自己。这是现代唯物主义科学与激进平等主义运动所取得的伟大胜利。它们成功地使人忘掉了爱欲,忘掉了“那曾被认为是人身上最神秘、最激动人心、最具生命力的东西”。

为了再现“爱欲之力量、危险与美丽”,布鲁姆开始了他的回溯之旅。他的第一站是卢梭和他的门徒(司汤达、奥斯汀、福楼拜、托尔斯泰),因为“卢梭离我们所拥有的对爱的回忆最近”。在布鲁姆看来,卢梭比其他任何人都要清楚布尔乔亚社会的问题。在布尔乔亚社会中,人只关心如何自保(self-preservation),只想着如何趋利避害,但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的长久联合也成了不可能的事。卢梭试图用浪漫主义的爱(romantic love)来解布尔乔亚社会习俗的毒,但这一解决方案失败了,因为“卢梭和他的门徒试图无中生有,试图用一根绳索将人从最初的泥淖里拉出来,但这根绳索却无法和任何位于高处的东西相连,除了希望和抱负”。浪漫主义是卢梭的建构,它曾一度给生活在无爱的布尔乔亚社会中的人们带去了希望,但是,随着它自身的那些有限可能被穷尽,它也失去了自身的魔力,最终,它的那些美好愿景落空了。

作为对卢梭及其浪漫主义计划的修正,布鲁姆随后将目光投向了莎士比亚和柏拉图,这两位他毕生致力思想家。他相信,相较于卢梭那完全人为的(artificial)浪漫主义计划,莎士比亚和柏拉图是更为优越的选择(虽然他对卢梭的浪漫主义计划抱有极大的同情)。因为莎士比亚“不打算从幻觉中创造爱情,而是打算真实地呈现它……他是自然最纯粹的声音,因为他并不对自然进行干预”;而柏拉图“不但与莎士比亚一样忠于自然,而且他还通过一个比戏剧更宽的光谱来表述爱欲,并对爱欲的意义作了一番更为贴切的理性论述”。

但是在布鲁姆眼里,这还不是莎士比亚和柏拉图胜过卢梭的全部理由。这一点通过蒙田的那个插曲最为清楚地表现了出来。在

对蒙田《论友谊》的讨论中,布鲁姆指出,现代人(以卢梭及其浪漫派计划为代表)几乎从不讨论以自身为目的的友谊,而“在古典著作中却充满了这样的讨论”。对布鲁姆来说,古人(以莎士比亚和柏拉图为代表)能同时给予爱和友谊其所应得的关注,因而超然于现代人之上。“这[爱和友谊]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关系,而且它们还很不幸地彼此冲突——除非存在一种自然的等级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一种关系优先于另一种”。浪漫主义的爱指向肉体的联合,而友谊指向灵魂的联合——哲学,因此友谊必然高于欲爱。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布鲁姆相信,不管他对卢梭怀有怎样的特殊情感,柏拉图和莎士比亚都要胜过他和他的门徒。

“当我写作这本书的时候,我正从一场大病中康复过来”,在导言的最后,布鲁姆这样写道。但这不是真的,不论我们有多么希望它是真的。在遭受了一系列来势汹汹的恶疾折磨之后,布鲁姆的生命最终定格在1992年的那个秋天。他的这部“会饮”也成了他留给这个世界的“斐多”。毫无疑问,就像蒙田从未从他的朋友拉博埃西的死中恢复过来,他的离世无疑给热爱他的朋友和读者造成了永远无法痊愈的创痛。就像贝娄(Saul Bellow)在以布鲁姆为原型的传记小说《拉维尔斯坦》(*Ravelstein*)的末尾所说:“你很难说服自己相信,像拉维尔斯坦[布鲁姆]这样的人居然已经死了。”

### 三

由于《爱与友谊》的第二部分《莎士比亚与自然》和第三部分《爱的阶梯》早先已有中译,<sup>①</sup>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并未对这两

---

<sup>①</sup> 《莎士比亚与自然》收录于《莎士比亚笔下的爱与友谊》,马涛红译,华夏出版社,2012。《爱的阶梯》收录于《柏拉图的〈会饮〉》,刘小枫等译,华夏出版社,2003。

部分进行重复劳动。译者要特别感谢浙江大学哲学系的林志猛博士,是他促成了译事,了了译者多年来的一个心愿;感谢浙江大学比较文学系的许志强教授,从他出色的教学中,译者收获颇丰;感谢华夏出版社的马涛红女士自始至终的帮助,她所付出的辛劳,远远超出了译者的想象。

胡辛凯

2015 年春

于浙江大学哲学系

# 目 录

中译本导言 / 1

一 爱欲的堕落 / 1

二 卢梭 / 30

三 司汤达的《红与黑》 / 171

四 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 / 212

五 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 / 233

六 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 / 258

七 浪漫主义的余波 / 290

## 附

蒙田与拉博埃西 / 297

尾声：爱与友谊 / 318

## 一 爱欲的堕落

本书是一次尝试，一次在恰当的老师 and 知者 (knowers)，即那些诗性作者们的指导下再现“爱欲 (eros) 之力量、危险与美丽”的尝试。我不得不使用“爱欲”这个词，虽然这有悖于我的意愿——不仅因为“爱欲”那陌生且多少有点自命不凡的希腊感 (greekness)，还因为从弗洛伊德和马尔库塞开始，它就成了一个流行语 (buzzword)。如今，面对那曾被认作是人生最有趣的经历的东西，我们的语言已变得贫乏，而这必然又预示着一种感觉上的贫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聆听那些古代作者的原因，因为他们严肃地对待“爱欲”，并懂得如何言说它。

现在，“爱”这个字几乎和“一个人对另一个人不可抗拒的吸引力”以外的所有东西都扯上了关系。而“性”这个遮遮掩掩的伪科学词汇唯一告诉我们的是：人都有特定的生理需求。在当今关于性的公开讲话中，存在着一种可怕的“实事求是”。在电视上，学生会向我们讲述他们如何在那些性“接触”——本来我是打算称之为“历险”的，但那可能会夸大他们的意思——中使用安全套。在脱口秀节目里，年轻的大学生会告诉我们她们如何确定自己是否在各式各样的“邂逅”中遇到了强暴。如今，德性空有愤慨，却无处抱怨。性被作为“疾病与权力”这样的重要问题的一个附带方面，被说得很酷，且没了任何古老清教徒式的羞耻感。我们时代的性话题是关于“如何获得更大的肉体满足”（尽管这样的话题在日趋减少）或“如何保护我们免遭另一方的伤害”（这样的话题在日趋增多）的。而古代的观点是，语言的微妙 (delicacy) 是爱欲本性——某种神圣的本性——的一部分，用其他任何方式言说它都会造成对它的

误解。那深植于爱欲之中的对人之联合 (human connectedness) 的渴望和随之而来的风险已经消失。我们的语言是一种将对他的渴望简化为对个体私人满足与安全的需要的语言。

孤立 (Isolation), 一种与他人缺乏深交的感觉, 似乎是我们时代的病症。存在着许多精神治疗的产业, 它们用“关系”——这个苍白无力的伪科学词汇的遮遮掩掩使得实实在在的爱恋变得不可能——来表达我们所遇到的困难。这种描述人之联合的方式肇始于我们的爱恋的不得已性 (tentativeness), 肇始于那个被假定的事实, 即我们生来就是一些独立的原子, 但由于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 所以我们就想要从属于集体, 而这样一种情况最多只能使契约关系成为可能。尽管公民身份、家庭、爱及友谊有着各不相同的基础与需要, 但这个抽象的术语 (社会契约) 却将它们全部置于同一种权宜与概括之下。现在, 当人们听到“把某人伟大的爱描述成一种关系”时, 他们不得不装聋作哑。在罗密欧与朱丽叶之间存在着一种“关系”吗? 这个术语仅仅适用于像“他们之间存在着暧昧关系”这样的表达。它暗示了一种不区分不同等级与程度的恋爱的朴素平等主义。“关系”是基于“同意”, 就好像说“我还没打算同意”。这是一个空洞的术语, 它暗示了人之联合只能出自一种无目的的自由行为。这种表述散发着一股萨特在《禁闭》(No Exit) 里说的“他人即地狱”的味道。<sup>①</sup> 正是当代的这种状况让我曾把我们描述成是活在社会中的遁世者 (social solitaries)。但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我们已经达到了被卢梭如此生动描述过的同时被康德——他向卢梭看齐——称作是升华之典范 (the model of the sublime) 的那种独立、自足的状态, 而是说, 我们是孤零零地活在社会之中, 空有对他人的社会性需要, 却又无从得到满足。

不过总的说来, 如今人们——尤其是那些年轻人——最紧迫的

---

<sup>①</sup> 萨特,《禁闭》,见《禁闭及其他剧作》,Stuart Gilbert 译,New York:Vintage,1949,第47页。

需求,还是人的联合,一种超越“由自私自利引起的孤立”的联合。在这种联合中,为自己考虑与为他人考虑密不可分。在政治上,这种“对人之联合的需求”出现在对共同体的寻求之中,它不同于自由派个人主义者(liberal individualist)的简单集合。致力于达成这个目标(鉴于我们这个社会的结构及其基本原则,这个目标也许是不可能的)的严肃思考与行动已有很多,但在实践上,我却看不到有任何试图将其建立在爱欲之上的努力,虽然爱欲——这一自然的倾向总是出现在每个社会里,并且超越具体的社会原则和政治原则——无疑能将我们连在一起。对家庭分崩离析所表达的哀痛也已有很多,但在实践上,我却见不到有任何试图恢复恋爱规矩(romantic rituals)——它曾为家庭的诞生做了铺垫,并最终导致了家庭的诞生——的努力。我们见到的是一种奇怪的倒置:一方面,我们在努力使社会契约变成一个在其成员之间有着更少算计却有着更多感情的联合方式;而另一方面,我们却又在努力地将爱欲关系变成一种契约关系。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描述成是“自我”与“他者”之间的关系是典型的现代方式,而这种方式就像是在两个人之间挖了一道无可逾越的鸿沟。

随着这个世界不再抱有幻想,它也开始去爱欲化(de-eroticization),而这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它似乎是一系列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我们的民主制度及其拉平(leveling)和自保的倾向、一种不可避免地将爱欲解释为性的“还原论-唯物论”科学,以及那个因上帝及其从属之神爱欲之死所导致的气氛。这一点从当今卑下而可笑的潮流中即可一览无余,例如,刚踏进史密斯学院(Smith College)的年轻女子被告知,外貌歧视(lookism)如今也算在像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同性恋歧视这样公认的恶习之中。然而爱欲——虽然遗憾但这确是事实——正是从偏好(preference)开始的,它首先建立在两眼所见的东西上,建立在体现了肉体之美的理型(ideal)上。没有一个严肃的人会主张爱欲止步于肉体之美,但如果这种必要的“开始”受到了抑制,那么我们也要和爱欲说再见了。一种好的教育应



#### 4 爱的设计

该致力于鼓励和提升对美好之物的爱,而一种病态的、被误导了的卫道主义(moralism)却反其道而行之,它将这种渴望变成了一种罪行,因为这种渴望违反了“让每个人都能感觉不错”以及“以平等之名克服自然”的高尚目标(就好像美国人对美好之物已经有了一种高度发达的鉴赏力,且懂得在各种美好之物之间作出区分一样)。对美好之物的爱也许是激进平等主义的最后一个牺牲品,也是最美好的牺牲品。

或许考察爱欲之堕落的一种方式就是去看一看那如此深远地影响了美国人的伟大作品——金赛性学报告(The Kinsey Report)。<sup>①</sup>它就像一颗出现在美利坚星空上的彗星,给那些自责地认为只有自己在做“那些事”的人以舒适、安慰和鼓励,以及大量其他所有人所做之事的激动人心的细节。1948年那起对美国性实践多样性的公开而广泛的讨论是非同寻常的,因此可以说,金赛性学报告满足了那些想要谈论和思考其私人性生活但又缺乏勇气的人。曾经也有过一些试图使其成为丑闻的尝试,例如声称作者是个性变态或作者有着不健康的淫乱行为。但这是在美国,科学的纯洁性和客观性不容那些道德狂热分子和宗教狂热分子的玷污。对金赛深信不疑的东西的攻击只会得到这样的答复:“这个人可是一位科学家!”——而这句话的意思是,他的客观性让他超然于所有如此这般的不满之上。金赛就是真理,我们不得不接受它,虽然这对大多数人而言也不是什么难事。

金赛本人是一个大块头男人,精神饱满,留着板寸头。他是美国德性(American virtues)的典范。据称,他在研究性学的同时也研究黄蜂。一个科学家不必告诉我们“他为什么这么做”、“他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他在许多领域内寻求真理,然后用自己的研究成果

---

<sup>①</sup> 金赛(Alfred C. Kinsey),柏莫罗(Wardell B. Pomeroy)和马丁(Clyde E. Martin),《男人的性行为》(*Sexual Behavior in the Human Male*), Philadelphia: W. B. Saunders Co, 1948。